

改朝換代 夾縫中的臺灣人

文／戴寶村（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）



▲吳德功《讓臺記》（左圖）記錄割臺之際臺灣社會情狀；洪棄生《臺灣戰紀》（右圖）即《瀛海偕亡記》。

戰爭、條約與割讓臺灣

1894年適值甲午年，該年3月朝鮮因境內的東學黨之亂，清日兩國皆派兵前往朝鮮。事件平定後，因日軍仍駐留朝鮮，不願撤軍，引發清日兩國在8月1日正式宣戰，隨後雙方在黃海、朝鮮半島、遼東半島、山東威海衛等地展開空前的激戰。清帝國在這場戰役中大敗，被迫與日本和談。

1895年4月17日清日雙方代表李鴻章與伊藤博文，於馬關春帆樓簽署「日清講和條約」，應允將臺灣全島、澎湖列島讓予日本，從此改變臺灣未來的命運。無辜被捲入的臺灣人民，有人反抗、有人順應，有些人選擇遁世，有些人則選擇離鄉背井遠赴唐山，被迫在時代的夾縫中求生存。

保鄉衛土反抗者

割臺的消息及條約內容傳回臺灣後，島民倉皇失措面對清廷無力挽回割臺的頹勢，部分臺灣士紳階層轉而寄望外援，希望透過第三國的勢力迫使日本放棄領有臺灣。1895年5月15日，丘逢甲（1864-1912）等臺灣士紳率訪臺灣巡撫唐景崧（1841-1903），發表〈臺民布告〉，表明臺灣自主，

據為島國的意向。5月23日發表〈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〉，5月25日宣布成立「臺灣民主國」。唐景崧被推為臺灣民主國的大總統，劉永福（1837-1917）被推為大將軍，定年號為「永清」，以「藍地黃虎」為國旗。然而，隨著6月4日唐景崧逃離後，臺灣民主國形同瓦解，前後僅13天。南部的劉永福與旗下黑旗軍苦守至10月離去，而後日軍順利進入臺南城，11月18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宣布「全島悉予平定」。

臺灣民主國始終沒有發揮太大的戰鬥力，遠不如由民間鄉里傳統的保甲聯防與動員組成的武裝義軍，如吳湯興、姜紹祖及徐驥等自備軍餉、集結鄉民抗日，都是著名的例子。臺灣人民以短命的臺灣民主國為起點，展開乙未抗日戰爭，並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，為保鄉衛土持續進行武裝抗日行動。

西瓜倚大邊的順應者

唐景崧逃亡後，臺北大亂，艋舺、大稻埕鉅商李春生（1838-1924）等人，決定迎接日本軍進城維持治安。艋舺雜貨店「瑞昌成」店主辜顯榮自願受派前往水返腳（今汐止），與日本當局會面，說明臺北的治安紊亂，為恢復秩序，要求日軍儘快進城。另外，美國記者James W. Davidson等人也受臺灣士紳請託，前往基隆引導日軍進城。1895年6月7日，日軍抵達臺北城承恩門外，民婦陳法及其兒子從城牆上放下竹梯，協助日本軍隊入臺北城。

日本當局為統治需要，採取籠絡臺人手段，如授予公職或賜給紳章，配合執政

者的居多。如臺南文人謝汝銓，從小學習經書，積極投入科舉仕進之途，乙未之後開始學習日文，並進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就讀，畢業後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社，負責漢文欄主筆，後來又轉入昭和新報擔任主筆，也曾擔任臺北州協議會員。不過謝汝銓內心還是有些掙扎，不斷強調日本文化是新恩，傳統文學是舊義，不可即新棄舊，致力讓漢文與日文能夠並存。



▲1985年帶領日軍進臺北城的辜顯榮。

宜蘭頭城的李望洋（1829-1903），在清代曾考取會試一等，日人初臨即積極歸順日方，受聘出任宜蘭支廳參事、配綬紳章，他在斷髮在臺尚未成為風氣之時，已率先剪髮變服，雖被人稱媚日，但他以「吾以老頭皮易蘭城生命也」回應。他的「識時務」，也反映了當時臺灣人在時代巨變中的某種抉擇。

遁世者與赴唐山者

在乙未政權轉換之際，有文人面對日本當局籠絡仍不願出仕，如鹿港洪棄生（1867-1929），本名攀桂，1895年之後，改名繻，字棄生，從此絕意仕進，潛心於詩文，即使日本官方招徠也不為所動，以遺民終生。他在《瀛海偕亡記》一書的自序中寫到：「自古國之將亡，必先棄民。棄民者民亦棄之。棄民斯棄地，雖以祖宗經營二百年疆土，煦育數百萬生靈，而不惜斬斷於一旦，以偷目前一息之安，任天下洶洶而不顧，如割臺灣是已。」可看出他對清國割臺一事的怨懟。

《馬關條約》簽訂後，臺人有兩年選擇國籍的緩衝期，但大多家業已永續臺



▲李望洋在日人初臨時即積極歸順日方。

灣，選擇離開臺灣者只有六千多人。而日本統治期間，也有不少人為就業、就學前往中國，如李友邦加入了國民黨，謝雪紅加入共產黨；有人到中國華北日人控制區，如張我軍、洪炎秋，還有人前往滿洲，如新竹人謝介石當

到滿洲國第一任的外交部總長。

無國者之無奈

1894年的甲午戰爭及後續的《馬關條約》，臺灣成為日本領土，這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一大勝利。清帝國的船堅炮利自強運動，結果還是敗在其鄙視的日本，臺灣告別清（中）國，被推向近代化、日本化的道路；而當中國再領有臺灣後，臺灣竟成中國創傷式的民族主義下「失敗者的報復」的對象，陷入再殖民的處境。

兩甲子前的戰爭與條約，看出清帝國割讓邊隅臺灣，力保起家之地的遼東滿洲，在臺官紳被迫倡設民主國力圖轉圜，清國及國際間未給予奧援，民眾亦不知民主國為何物？清帝國無法妥善處理戰後締約該履行之事務，清兵轉變為亂兵，又妖魔化新政權的日本，使讓民眾陷入無名的恐慌。臺人抗裝抗日是面對新統治者的無知與恐懼，付諸自發式的保家護土行動，相當程度是延續前清時代的抗官民變，屬原始性叛亂色彩居多，這種無知與無力，難以改變當時的命運。臺灣在日治時代長期進行武抗到文抗，儘管規模、性質有別，成果亦有限，但從中可看到那種追求「不被管的自由」（Freedom of not being ruled）長存在社會底蘊，成為殖民近代化、文明化下臺灣人自治的渴望。☞